

清代番薯在江西的引种和推广

李昕升^{1,2} 王思明²

(1.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江苏 南京 210095;

2.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江西在康熙年间始有番薯记载,是由闽粤流民引种而至。由于番薯的代粮优势,乾隆年间江西屡兴劝种活动。然而并非主要由于劝种因素,番薯在江西的推广成效颇佳,乾隆年间已经广泛分布在江西山区。及至晚清,是番薯的大规模种植阶段,至迟在19世纪中期在全省推广完成,奠定了番薯作为全省第二大粮食作物的地位。江西亦与闽、浙、粤一道共同构成东南番薯集中产区。

【关键词】清代;番薯;江西;引种;推广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2-0039-10

Introduction and Spread of Sweet Potato in Jiangxi Province

LI Xin-sheng^{1,2} WANG Si-ming²

(1.Postdoctoral Station of Colla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2.Institu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Sweet potato was recorded during Kangxi period in Jiangxi, which was introduced by Fujian and Guangdong immigrations. Beca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sweet potato, government repeatedly to persuade farmers to cultivate during Qianlong period in Jiangxi. However is not the main reason to the persuade activities, promoting effect of sweet potatoe was good in Jiangxi, and has been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mountains of Jiangxi during Qianlong period. Until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was a large-scale cultivation stage. Promotion completed in the province at the latest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which laid the sweet potato as the second largest food crop in the province. Jiangxi, Zhejiang, Guangdong and Fujian constituted the southeast potato producing areas together.

Keywords: Qing Dynasty; sweet potato; Jiangxi; introduction; spread

以番薯为代表的高产美洲作物传入中国,本身就是一种技术革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提升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容量边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斯密型增长^①。目前针对番薯史的专题研究较多,但尚未涉

【收稿日期】2016-02-20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一带一路’视野下美洲作物在中国的推广及影响研究”(2015M580439);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基金面上项目“美洲救荒作物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SK2016002)

【作者简介】李昕升(1986-),男,博士,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师资博士后,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农业史;王思明(1961-),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史。

① 总产值和人均产值都有增加,但是较慢、有波动、持续性不确定属于量变,而非质变。

及江西^①。民国以来番薯在江西是仅次于水稻的第二大粮食作物,重要性远高于同为美洲作物的玉米和其他传统水旱粮食作物。但根据曹树基的研究,有清一代江西并不属于番薯的集中产区^②,事实是这样吗?这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问题之二:韩茂莉认为江西属于番薯引种的第二阶段^③,甚至落后于山东,临近闽粤的江西为何引种速度如此之慢?问题之三:乾隆年间掀起了番薯推广的高潮,各方劝种活动广泛,江西的推广成效如何?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番薯的引种:再论“薯”与“番薯”

番薯传入中国的路径,一般认为有东南一线和西南一线两条路线,但是后者尚有争议。万历十年(1582)陈益从安南引种番薯到广东,是目前最早的记载,其后又有多人多次分别从越南、菲律宾引入到广东、福建,陆路与海路并行。早在民国时期,对该问题的研究就已经相对客观、成熟,“甘薯之输入中国,首为救荒;1593年,闽省荒灾,朝廷遂遣派大臣至邻岛吕宋搜寻救荒作物,期以拯民于饥馑之中;其时闽人之侨居于吕宋者甚众,咸以甘薯为荐,乃于1594年输入栽培,成绩极佳……其流布之速,殊不亚于亚洲大陆之开发也”^④。兹不赘述。

江西在地理区域上与福建、广东接壤,尤其与福建约有三分之一的共用省界,江西从福建、广东引种番薯似乎是很自然的,文献记载更为可靠,类似反映江西番薯从福建、广东引种的记载很多,如乾隆《建昌府志》:“甘薯,俗名番薯,以种自南番故名,近得自闽粤,形似薯而圆小”^⑤,嘉庆《丰城县志》:“甘薯:种出交广,皮紫肌白,生熟可食,味香美”^⑥。除了与二省临近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明清时期的流民因素。明中期开始,闽粤流民向赣南山区推进,明后期闽南流民越过赣南进入赣西北山区,清初闽粤流民占据了包括赣东北在内的整个江西山区,在清前期达到高潮,清中期逐渐归于沉寂^⑦。

早在清初赣东南的石城县就有记载:“番薯,原出交趾得名,形似薯而圆小,有皮紫肉白,又有皮肉俱白,味甘,蒸煮皆宜,生食更脆,石邑向不多有,近下乡种山者繁殖,以备二铺不足,虽多食不伤人,亦救荒一善物也。”^⑧反映明清之际番薯已经传入,成为重要的救荒作物,也是在江西救荒的最早记载。康熙《石城县志》又载:“赣田少山多,向皆荒榛丛樾,近年闽人赁土耕锄,石邑下水颇多。”^⑨可见石城县作为番薯最早传入地区之一是很合理的,且是由福建流民引入,赣东南也是流民最早进入的地区。

① 2004年之前的研究见曹玲:《明清美洲粮食作物传入中国研究综述》,《古今农业》2004年第2期。2004年之后如黄福铭:《明清时期番薯引进中国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欧阳春林:《番薯的引种与明清福建沿海社会(1594年~1911年)》,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邵侃,卜风贤:《明清时期粮食作物的引入和传播——基于甘薯的考察》,《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第22期;周邦君:《甘薯在清代四川的传播及其相关问题》,《古今农业》2010年第2期;吴理清:《番薯在潮州地区的传播与农业体系变动》,《农业考古》2012年第4期;张茜:《甘薯在四川的传播及对四川饮食文化的影响》,《农业考古》2013年第3期。另有讨论美洲作物涉及番薯的数篇。

② 曹树基:《清代玉米、番薯分布的地理特征》,《历史地理研究》(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③ 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62页。

④ L.Canington Goodrich, 蒋彦士译:《中国几种农作物之来历》,《农报》1937年第4卷第20期。

⑤ 乾隆二十年(1755)《建昌府志》卷13《物产考》。

⑥ 嘉庆十三年(1808)《丰城县志》卷5《物产》。

⑦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

⑧ 康熙十二年(1673)《石城县志》卷3《物产》。

⑨ 康熙十二年(1673)《石城县志》卷3《物产》。

根据笔者对同为美洲作物的南瓜的研究,江西南昌府的靖安县早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已见南瓜记载,是由闽南流民传入,福建嘉靖十七年(1538)始有南瓜记载^①。也就是说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南瓜已经从闽南引种到了赣西北。番薯在1582年已经传入福建,较早发挥了其作为粮食作物的优势,“一亩地有数十石之获,比土蔓省力而获多,贫者赖以充腹”^②,尤其官方推广的力量,如金学曾、徐光启等人,使得番薯在短时期内形成了跨越南北的推广区域,官方的传播具有跳跃性,无论是万历年间的《海外新传七则》还是《甘薯疏》都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天启年间王象晋在山东进一步扩大了番薯的影响力,番薯的推广比玉米顺利得多,入清之前玉米完全没有被充分认识,玉米开始发挥优势已经到了乾隆年间,而番薯则在晚明就受到了舆论的肯定,很难想象番薯只是在东南沿海一带推广,从福建、广东到浙江、江苏、山东,而忽略了江西,从地缘远近的角度,江西较山东可以更快地获悉官方的条文,更何况闽粤入赣流民在番薯传入中国之前已经形成规模。那么何以番薯经历了漫长的一百年,直到1673年在江西方见记载?

笔者爬梳史料,终康熙一朝,文献明确记载番薯的还有如下两项:

康熙《新昌县志》:“番菜,种自南夷,今处处有之,惟新昌种于山者皮紫而肉黄,味甘更胜。”^③

康熙《赣州府志》:“薯……又一种番薯以种出交趾得名,形似薯而圆小。皮紫肉白味甘并可酿酒,蒸煮香甘不及鲜食之脆爽。”^④

新昌(今宜丰)位于赣西北,赣西北是赣北山区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流民进入和农业开发均早于赣东北,以番薯为代表的旱粮作物发展在赣西北特别引人注目,已经“处处有之”。赣南的赣州府自然与石城县所在的宁都府一样都是番薯随着客家人最早进入江西的地区之一,赣州府也是江西最先用番薯酿酒的地区。

笔者注意到康熙年间除了以上三条记载,对于“薯”的记载特别多,当然薯并不能认为就是番薯,因为我国原产的薯蓣(山药)在番薯传入中国之前也常常被称为薯,江西亦如此,正德府志载“薯,即玉延,种于圃,大者四五斤,一名山药”^⑤,明清之前对薯的记载颇多。但是,何炳棣早有论述,只要与山药和芋并列,红、白、紫、黄蓣(芋)、藷(薯)、苕都是只番薯,何的结论建立在三千余册方志的基础上,自然能够反映历史面相;而后曹树基对该说提出质疑,以七千余册方志为蓝本,发现不乏薯即山药的记载^⑥。曹说固然具有合理性,但是亦不能说明全国薯均是山药,曹通过华南方志指出华南一带的薯常指山药,其他地区(包括江西)并无列举,而何的判断亦是建立在江苏、浙江方志记载的基础上。况且,山药一称当今在河北常作为番薯的代称,似乎山药也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薯蓣。所以孰是孰非,不能一概而论,关键还要根据当地具体的风俗习惯,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知识特征。

曹本人也认为山药块茎形状与番薯块根相似,所以明清时人经常混淆。所以笔者认为把番薯称之为薯的情况还是存在的,一方面是因为著书立说的多是文人墨客,他们缺乏农业实践,因此把此薯作为彼薯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另一方面,薯蓣虽是本土作物,但其功用与番薯相比实在差得很远,在番薯广泛推广的前提下,用薯来指代番薯是很自然的,甚至在不知番薯来历的情况下,想当然地认为番薯古已有之,薯之记载由来已久,如同今天我们也单用薯来指代番薯。此种情形在江西适用,“薯即番薯,种

① 李昕升,王思明:《南瓜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中国农史》2015年第1期。

② 万历四十年(1612)《泉州府志》卷3《物产》。

③ 康熙五十七年(1718)《新昌县志》卷1《物产》。

④ 康熙五十一年(1712)《赣州府志》卷18《物产》。

⑤ 正德九年(1514)《袁州府志》卷2《物产》。

⑥ 曹树基:《玉米和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

自南夷故名,今又有六十薯及本地薯之别,六十薯皮紫而肌白,本地薯皮白而肌红,蒸食味更佳”^①。

至于山药与薯并列的情况,笔者认为很有可能薯就是指代番薯,因为无论古今中外,山药多是以“块茎长圆柱形,垂直生长,长可达一米多,断面干时白色”^②为主,曹所说的块茎呈卵球形、圆锥或其他不规则形状的山药,并不常见,在江西除了圆柱形的山药之外,就是脚板形的山药,学名毛薯,在江西通称脚板薯,从古到今一直是江西名小吃,“脚板薯,剪片作种,但要带皮,其苗蔓生,根下结块,大可五六斤,味同山药,搗粉作团,用油泡之,素菜佳品也。”^③众多方志将其与番薯进行了区分,一般不会混淆。还需要指出的是,番薯在江西的常用别名还有甘薯、山薯,如“甘薯,有山薯、番薯二名”^④，“薯,俗呼为山薯,种出交趾,故又名番薯”^⑤,类似记载颇多。

要之,笔者认为以明清之际为分水岭,入清之前江西的薯多指山药,清代以降薯则常为番薯,如果笔者的推论成立,则康熙年间番薯的记载骤然增多,包括奉新县(1662)、南昌府(1663)、武宁县(1666)、石城县(1673)、新城县(1673)、崇仁县(1673)、建昌县(1675)、浮梁县(1682)、萍乡县(1683)、上犹县(1697)、赣州府(1712)、新昌县(1718)。主要分布在赣南、赣东南、赣西北山区,赣西北山区尤盛,同时赣西北亦成了番薯最早引种至江西的地区;分布范围之广并不是传统学界认为的康熙年间方有偶种一二,甚至落后于山东处于番薯引种的第二阶段。如此看来,番薯在江西的推广也属于第一阶段,几乎和大运河一线同时推进,又由于移民的因素,番薯的推广呈现出推广的跳跃性和依距离引种源远近的渐进性相结合的复杂特点。

除了对“薯”字的解读之外,还可以用来佐证的是文献的记载,笔者所列上述府县,康熙方志及后世续修、重修方志可以证明薯为番薯,而不是笔者的异想天开。奉新县“薯,有二种,白者佳,青黑者味殊不美”^⑥。青黑者山药殊为罕见,可能为番薯;乾隆初年《南昌县志》番薯“处处有之”^⑦,康熙南昌府很可能已经栽培,何况康熙南昌府另有“薯蕷,即山药”^⑧,明显薯蕷与薯不是一物;武宁县同时记载了薯和薯蕷,且道光《武宁县志》载“薯,有山薯、番薯二名”^⑨;新城县“薯,有紫白二种,又一种名佛掌”^⑩。乾隆《新城县志》:“薯,有二种,俱大如臂,白者稍短,紫者长可一尺余,味甘脆腻,煮食甚美,又一种似姜而肥大”^⑪。知其薯中有番薯;崇仁县不明;建昌县(今永修)“薯,四月下种,苗生蔓延,八月采根,一枚可重数斤,性味类山药”^⑫。通过描写虽然类山药而不是山药,生长周期亦是番薯特征,光绪《建昌县乡土志》对薯的大篇幅叙述均是番薯无疑;浮梁县“薯,似山药而大,可十倍”^⑬,当为番薯;乾隆《萍乡县志》:“薯,山薯、土薯皆是,又有雪薯、甘薯”^⑭,薯是薯类的全称,包括番薯;上犹县不明。上述两府九县,除了崇仁、上犹两县情况不明,其他均可确定为番薯,更加肯定了有清一代江西薯多为番薯的事实。崇仁、

① 民国二十九年(1942)《宜春县志》卷3《物产》。

②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植物志》,第16(1)卷,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03页。

③ 同治十三年(1874)《永丰县志》卷5《物产》。

④ 同治十二年(1873)《南昌府志》卷8《土产》。

⑤ 道光四年(1824)《宁都直隶州志》卷12《土产志》。

⑥ 康熙元年(1662)《奉新县志》卷1《土产》。

⑦ 乾隆十六年(1751)《南昌县志》卷6《土产》。

⑧ 康熙二年(1663)《南昌郡乘》卷3《物产》。

⑨ 道光四年(1824)《武宁县志》卷12《物产》。

⑩ 康熙十二年(1673)《新城县志》,转引自《方志物产265》,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藏,第39页。

⑪ 乾隆十六年(1751)《新城县志》卷3《物产》。

⑫ 康熙十四年(1675)《建昌县志》卷1《物产》。

⑬ 康熙二十一年(1682)《浮梁县志》卷1《物产》。

⑭ 乾隆四十九年(1784)《萍乡县志》,转引自《方志物产260》,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藏,第205页。

上犹之薯为番薯,似乎也并无不可。

总之,清初番薯已经分布在江西多地,并逐步扩大种植地域,由于文献记载均晚于实际引种时间,甚至有可能在明末已经引种至江西,是中国最早引种番薯的(内陆)地区之一,也就证明了江西不可能无视邻省福建、广东、浙江番薯的大肆推广而不被影响。清初番薯的引种为乾隆以来番薯在江西的大面积推广和广泛分布奠定了基础。

二、番薯的劝种:人口压力还是救荒权宜?

乾隆年间是番薯在全国推广的一个高潮,各省政府纷纷劝种,传统观点是人口压力说。王保宁在厘清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前提下提出了救荒权宜说,认为灾害频仍导致的饥荒是番薯推广的原因,灾荒过后番薯价值降低,所以尽管政府一直劝种,播种面积却不大,出现长期“引而不种”的现象,明末之后的劝种活动与人口压力没有直接关系,只是救荒政策^①。王说自然很有启发性,也适用诸如山东、河南等省,然而以江西进行剖析,似乎该观点并不具有普世性。

已有通过对江西清代全部地方志进行细致分析发现:江西顺治、康熙年间旱灾比较突出,但总的灾害较少,康熙中期到乾隆末期是江西灾害发生的低谷时期,自嘉庆以后,江西水旱灾害的发生逐年上升,呈频繁趋势^②。就全国来说,乾隆年间江西的劝种活动是次数较多、范围较大的,乾隆末年番薯的推广或许是由于灾荒因素,但是乾隆中前期番薯推广效果亦是不错,但此时是灾害发生的低谷,用救荒权宜来解释就有些行不通了。大庾县知县余光璧的劝种活动是清代地方政府最早劝种番薯的事件:

光璧按,番薯,一名地瓜,有红白二种,本蔓而根生,秋种冬收。万历间福建巡抚金学曾传自外国,故名番薯。闽兴,泉漳人种之,每亩地可收三四千斤,用代谷食,余者于冬至前后切片晒干,藏之,作次年粮。剉为粉,比豆糜为佳,食之甚益人,货通江浙楚粤,至今大被其利。庾邑近亦有种者,但未得其法,故不能多生,予尝出示告以种法,今墟市中见有比前略大者,然犹未得如闽之获利,多栽种者自不令而从也。闽中志书以其系民食,列于五谷之后,予因其种类各殊,收入蔬菜类中,未免屈抑,然蔬菜亦百谷之中之二十种也^③。

王保宁认为余光璧推广番薯的时间在乾隆七年到九年(1742-1744)之间^④,正好这几年大庾县水旱灾害交替、米价腾贵,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广,归因于灾荒似乎顺理成章。但是余光璧的劝种文中丝毫未提及灾荒的因素,如果在灾荒的背景下推广,断不应如此;余光璧提到的“货通江浙楚粤,至今大被其利……今墟市中见有比前略大者,然犹未得如闽之获利,多栽种者自不令而从也”均可见番薯的功用除了“用代谷食”之外,利益驱动亦是其种植的主要原因之一,单纯的救荒作物极易获得,一般难以产生经济需求,如果出于救荒目的,于常理不合。此外,“余光璧,字惧瑕,莆田举人。乾隆六年知大庾县,有词藻,勤民事。向平糶多以谷,光璧逐日碾为米,民尤便之。”^⑤余光璧身为福建人,自然知晓番薯的优势,引种到大庾县是很正常的,而未必是在灾害的影响下,同时也未提到余光璧推广番薯的功绩;同治《大庾县志》介绍了发生在乾隆七、八、九年的灾害情况和应对措施,应对措施包括储谷救荒、平抑物价、以工代赈等方面^⑥,唯独没有提到救荒作物,如果余光璧以知县身份发布劝种文,方志不应不记

① 王保宁:《乾隆年间山东的灾荒与番薯引种——对番薯种植史的再讨论》,《中国农史》2013年第3期。

② 陈银生:《清代江西灾荒与民间救灾探略》,江西师范大学,1997年,第6页。

③ 乾隆十三年(1748)《南安府大庾县志》卷4《物产》。

④ 王保宁:《乾隆年间山东的灾荒与番薯引种——对番薯种植史的再讨论》,《中国农史》2013年第3期。

⑤ 同治七年(1868)《南安府志》卷15《名宦》。

⑥ 同治十三年(1874)《大庾县志》卷15《拾遗》。

载,可见劝种活动发生在平年,余光璧的劝种活动很可能发生在乾隆十年(1745)之后。

有清一代江西自然灾害统计,无论是南安府(78次)还是下辖大庾县(18次),^①在江西府县中都属于灾害发生频率较低的地区,如果大庾县这样灾荒较轻(乾隆九年之后大庾县少有灾荒,而且清代大庾县常平仓储谷定额在24240石、社仓3441石^②,在全省州县中处于上等水平)的县域因灾荒因素掀起劝种高潮,其他早在康熙年间已有番薯记载且灾荒更严重的府县不应该视番薯为无物,如康熙十八年(1679),赣州府“大水……田地庐舍人民悉漂没壅淤……田庐尽没,四日夜水方退,田庐俱成河坑”^③。康熙年间已经引种番薯的赣州府属却未见番薯劝种事件和广泛种植记载。

如果大庾县的番薯劝种不是救荒权宜,那么是出于人口压力吗?江西是人口大省,似乎这种解释十分合理。但就全省来说,乾隆十八年(1753)每平方公里27.86人(全国24.06人),直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每平方公里63.60人仍只是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9.14人)^④。江西人地矛盾凸显是在乾隆末年,人口达到饱和,移民运动也随之转向低沉。而大庾县所在的南安府人口密度向来是江西各府中最低的,如嘉庆二十五年(1820)为每平方公里82.53人,嘉庆十七年(1812)江西全省为127.02人^⑤;大庾县在人口和土地上与南康县、上犹县、崇义县相比区别不大,可知大庾县人地矛盾在江西从来都不是最突出的。所以,笔者认为大庾县的番薯劝种事件,既不是出于救荒权宜也不是出于人口压力,而是番薯一般性的推广活动。

我们再看乾隆五十年到五十二年(1785-1787)江西一省的劝种活动,此次劝种事件起因是响应中央的谕旨,劝种影响波及全省,也是乾隆一朝为数不多的由省级首脑直接下达的指示。乾隆五十年,弘历三令五申劝种番薯,清高宗实录就记载有五次之多。本文仅举一例:

有甘薯录一编,颇为明切易晓,现饬多为刊刻,颁行各府州县,分发传钞,使皆知种薯之利,多为栽种,等语,所办甚好……朕阅陆耀所著甘薯录,颇为详晰,着即钞录,寄交刘哉、毕沅令其照明兴所办,多为刊布传钞,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将此传谕知之。^⑥

乾隆五十一年,弘历再次重申:

据张若渚奏请,申伐蛟之令,以除民患,并请于江浙地方,学种甘薯,以济民食等语,江广一带,每于大雨时行,间有起蛟之事,深为民害,自应搜寻挖除防患未萌,至甘薯一项,广为栽种,以济民食。^⑦

江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最早做出多次表态,先于其他省份:

甘薯一项,或藤或果皆可作种,且春种夏收,夏种秋收,实属易种易生,堪为稻粱之佐,江右界连闽粤,土燥泥淤之处,间有种植甘薯者但不甚广徧,现已通饬各属,谆切劝谕视其土之所宜,广为种植,以尽地力,冀于民食有裨……乾隆丁未正月抚江使者山阴何裕城识。^⑧

乾隆五十一年冬,皇上特允阁学侍郎张公若渚之请,敕下直省、广劝栽培甘薯,以为救荒

① 陈银生:《清代江西灾荒与民间救灾探略》,江西师范大学,1997年,第31页。

② 光绪七年(1881)《江西通志》卷88《仓储》。

③ 康熙二十三年(1684)《赣县志》卷1《祥异》。

④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2页。

⑤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6、272页。

⑥ 《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16页。

⑦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268,“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癸未”,中华书局,1986年,第1104页。

⑧ 同治十二年(1873)《南昌府志》卷3《地理》。

之备。西江与闽粤近,不乏种植者,特未广耳,曩陆中丞耀司臬山东时有甘薯录之刻,博采群言,至为详备,卷末所载制用卫生数则稍涉细琐,然昔有其法不妨附存,重附开雕,通颁各属,俾吏民转为流播,广厥传焉,时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仲春初吉巡抚江西使者山阴何裕成书。^①

无论是乾隆还是江西巡抚何裕成,其劝种的初衷都是救荒,仅通过劝种文本本身就可体现,“因思豫省近年屡经被旱,虽现在已普得甘霖,自可赴种晚秋,但恐该处土脉久燥,雨泽一少,即与栽种无益,番薯既可充食,又能耐旱……转饬被旱各属,晓谕民人”^②。“即直省迤南各府今年亦因雨泽愆期,收成歉薄,番薯既可充食,兼能耐旱。”^③直接导火线就是乾隆五十年的大旱,“本年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等省春夏之间雨泽缺少,被旱处所较多”^④，“乾隆五十年,江南旱魃为虐,几至赤地千里……今则两湖、山东、江西、浙江、河南俱旱”^⑤。江西多地旱情严重,九江“夏大旱,自冬及春大荒,石米四两有奇,蕨根树皮食尽,平巢仓谷”^⑥,星子“大旱,斗米四百八十文,湖地有草名半年粮,民掘食殆尽,路多饿莩”^⑦,此外,南昌、瑞昌、德安、湖口、武宁、都昌、波阳等均是旱,乾隆五十一年持续大旱,波及范围更广,赣南歉收严重。可以说,此时何裕成的劝种活动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江西自身的救荒需要,前面已经提到在乾隆末年江西的人口压力已经较为突出,番薯的推广显得更有必要,乾隆五十年大旱结束后,江西也并没有同山东一样种植面积减少、出现长时期的“引而不种”局面,而是种植区域稳步增加、在民食中的重要性愈发突出。

要之,乾隆初期番薯的劝种既不是出于人口压力也不是出于救荒权宜,乾隆末期的番薯劝种则是在人地矛盾和自然灾害的双重压力下形成的作物选择取向,以往单纯归因于某一方面的劝种导向似乎略显单薄,即使是同一省在不同时间的劝种原因亦不相同,二者的共性在于无论是大庾县还是江西省,从地方社会和省级单位的角度,均在全国最早开始劝种番薯,这绝不是偶然,可见番薯在江西的特殊地位,无疑也增加了我们研究清代番薯在江西的引种和推广的意义。

三、番薯的推广:嘉庆前后

方志记载所反映的图1是乾隆年间江西推广番薯的情况,番薯实际种植区域应该多于阴影区域。一是康熙年间已有番薯记载的地区,如康熙《武宁县志》记载番薯,乾隆《武宁县志》土产只记载了稻、黑豆、玉米、茶等寥寥几种作物,在番薯已经引种到当地的情况下,方志未记载不代表未种植;又如建昌县则是乾隆年间未修方志。二是乾隆方志亦有不少只载“薯”之一字,但无法根据新旧方志判断薯为何物。三是类似乾隆《南康县志》物产中完全未记载蔬类,即使是中国本土蔬菜也无法判断是否种植。以上三种情况,尤其是第一种,虽然有可能推广了番薯,但一概不在图1反映,不作为番薯的分布区。图1包括图2,亦有根据后世文献推知当时当地已有番薯记载,如同治《玉山县志》载:“番薯,出西洋,闽粤人来此耕山者,携其泛海所得之苗种之,日渐繁衍,色黄,味甘,食之疗饥可备荒,历今百有余年矣。”^⑧番薯从乾隆年间便在玉山代粮,一发而不可收延续至今。

① 乾隆五十四年(1789)《南昌府志》卷2《土产》。

② 《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15页。

③ 《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16页。

④ 道光九年(1829)《安徽通志》卷首《诏谕》。

⑤ [清]顾公燮:《消夏闲记选存》,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1940年,第16页。

⑥ 同治十一年(1872)《德化县志》卷53《祥异》。

⑦ 同治十年(1871)《星子县志》卷14《祥异》。

⑧ 同治十二年(1873)《玉山县志》卷1《物产》。

赣西北、赣东北山区,赣南山区番薯广泛分布,与江西山地分布大致相同;而未种植番薯的地区,则是集中在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向心水系,鄱阳湖平原番薯推广最是缓慢。由此可见,至少在乾隆年间番薯在江西平原一带尚未打开局面,个中原因除了移民较少进入平原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番薯无法与水稻争地。

绝大部分州县都在乾隆五十二年江西巡抚何裕成的劝种活动之前就已经种植番薯,乾隆初年(与大庾县同时)形成推广高潮,如万载“甘薯,一名番薯,乾隆初来自闽广”^①,贵溪“先无此,近年得闽种,种者始多”^②,广信府“番薯……种之日渐繁多,色黄味甘,食之疗饥,可以备荒,历今三十余年矣”^③。总之,并非如何裕成所言在乾隆末年江西番薯种植“特未广耳”,事实上何止“西江与闽粤近不乏种植者”。真正在何裕成号召下种植番薯的州县恐怕也并没有想象得多,只有义宁(今修水)、新昌是在乾隆五十二年之后始有记载,然仍并不能确系是否何裕成劝种所致,当然在劝种前后推广力度、种植规模、重视程度等肯定还是存在差别的。图1、图2也正式以何裕成劝种的劝种活动后不久为分界线,也就是嘉庆前后。



图1 乾隆年间江西番薯记载分布图

尽管很难量化番薯在当地的种植面积,但番薯种植已经十分繁盛,“处处有之”尽可形容,“番薯,种自南夷,近处处有之,皮紫肌白,生熟皆可食”^④。“蕃薯,旧出吕宋国,今闽浙江广处处有之”^⑤。两地记载可窥见江西一省情况,尤其乾隆《龙南县志》更是将江西同福建、浙江一样视为番薯的集中产区。乾隆年间番薯已经常用来代粮,完成了从单纯救荒作物到一般粮食作物的转变,重要性可见一斑。“甘薯,一名番薯,有红白二种,田家以代粮。是名薯粮”^⑥。“薯蕷……且补一种根大如姜而皮紫,极大者重数斤,煮食俱美,南北之产或有不同,故形状各别,人多植之,可佐嘉谷”^⑦。“甘薯,俗呼为番薯,有红白黄三种,生熟皆可食,今乡中种者多,蒸熟,切片,曝干以充糗粮,名薯粮,比薯芋更佳”^⑧。“近年山农多种番薯可充三月之粮”^⑨。等记载不下十余次。曹树基认为的番薯虽然在清前期已经遍布整个赣南山区,但除了个别州县以外,并未成为主要粮食作物^⑩。如此看来恐怕也并非个别州县。

① 道光五年(1825)《万载县志》卷12《土产》。

② 乾隆十六年(1751)《贵溪县志》卷4《物产》。

③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广信府志》卷2《物产》。

④ 乾隆十六年(1751)《南昌县志》卷6《土产》。

⑤ 乾隆十五年(1750)《龙南县志》卷14《物产》。

⑥ 乾隆四十五年(1780)《清江县志》卷8《土产》。

⑦ 乾隆八年(1743)《铅山县志》卷4《物产》。

⑧ 乾隆十五年(1751)《会昌县志》卷16《土物》。

⑨ 乾隆四十一年(1776)《分宜县志》卷2《物产》。

⑩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

曹树基描绘的嘉道年间形成的东南番薯种植带并不包括江西,换句话说,番薯在客籍流民中虽然种植较多,但放眼整个江西,仍然排不上号。图2是嘉道年间番薯的推广分布图,可见番薯种植已经遍布全省,在道光年间完成番薯的推广工作,至迟在19世纪中期,江西已几无未见番薯之州县。图2似乎可见赣中和赣北的少部分地区未记载番薯,但笔者认为番薯已经完成全省推广基于以下理由:第一,与乾隆年间的分布图相比,图2少了德安、莲花、上犹、崇义、大庾,一般在一种作物引种到当地的情况下,除非受到排挤,否则均会持续种植,何况是番薯这样优势明显的作物;莲花厅嘉道年间未修方志,然同治《莲花厅志》有番薯记载,德安、崇义、大庾同莲花厅情况一致,上犹光绪之前再未修方志,光绪《上犹县志》又见番薯。第二,即使嘉道年间仍未记载番薯的地区,在咸同年间所修方志中也纷纷见载,这些地区要么嘉道年间未修方志,况且新作物民间引种——达到一定的规模——被文人墨客注意——写入方志,这一滞后性的过程是必经之路,如同治《崇仁县志》“多甘薯,有紫白二种”^①,同治《余干县志》“白薯、红薯”^②等均是咸同年间始见记载。



图2 嘉道年间江西番薯记载分布图

总之,嘉道年间番薯在江西推广成效颇佳,既归因于乾隆五十二年何裕成的号召,更是由于粮食供给不足。在传统社会地方大员的行政命令还是具有一定效力的,尤其这种命令于民有益,后世记载体现了这种影响:义宁州“江西巡抚何裕成重刊山东按察使陆耀所著甘薯录,通颁各属,俾广为流传,宁布种甘薯久矣,赖其利者甚众”^③,同治《南昌府志》直接道出了劝种的影响力:“旧志甘薯连篇累牍记载甚详,今则南昌各属,平畴山麓处处种之,其栽植之功在所熟识”^④。黄志繁认为江西1953年的耕地、粮食总产和粮食亩产量等数字与清代中期相似,也就是道光元年(1821)全省耕地41007635亩^⑤,即使今天江西耕地也不过4633.7万亩,笔者认为道光元年这个数字是可信的,当时已达到了传统社会能够开垦的土地极限,道光元年人口是2234.6万^⑥,可知道光元年江西人均耕地约为1.84亩,正是“人不及二亩”^⑦,因此以番薯为代表的高产杂粮倍受青睐,番薯弥补了由于人口压力大增而导致的“浮口”问题,充分利用了边际土地。

① 同治十二年(1873)《崇仁县志》卷1《物产》。

② 同治十一年(1872)《余干县志》卷2《物产》。

③ 道光四年(1824)《义宁州志》卷8《土产》。

④ 同治十二年(1873)《南昌府志》卷8《土产》。

⑤ 黄志繁:《清代赣南的生态与生计——兼析山区商品生产发展之限制》,《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

⑥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4页。

⑦ 道光四年(1824)《宁都直隶州志》卷11《风俗》。

嘉道年间,人民生计不可或缺的番薯,是重要的代粮作物,“土人种之以代饭,或切如米粒,曝干谓之薯粮,尤能久贮藏”^①,“丝片曝之,以备糗粮”^②,“蒸切晒干,收以充粮,为薯粉”^③,“甘薯,一名番薯,有红白二种,田家以代粮。是名薯粮”^④,“甘薯……南人用当米谷,果炙食之……耕者唯种此以充粮糗,名薯粮”^⑤,“薯粮”一词出现频繁,嘉道年间番薯的推广奠定了其近代以来作为江西第二大粮食作物的地位。基本上江西山地部分都是番薯的主产区。

进入近代,番薯完成了从一般粮食作物向主要粮食作物的转型,“山薯出最广,贫者半以此代粮”^⑥,同治《万安县志》把番薯移入了“谷之薯”:^⑦“薯,山谷亦可种,迩来贫者半资以为粮”^⑧,《牧童行》一诗所见更甚,“阿兄锄禾东郊东,阿爷灌薯北山北,去年番薯大如斗,能供一家四五口,今年番薯大如锥,一月饔殍不可支……一州之大数万家,仰食薯蕷十之七”^⑨,可见番薯在民食中的比例占据了一半,几与水稻分庭抗礼,与人民生存息息相关,“以薯当饭,乞邻火而煨之,每人四片,曾祇食半,犹藏其二以伺姑,饥复进焉”^⑩,是日常食物,早已超出了杂粮的功用。抚州府这样的平原大府,也成为番薯的出产大府,“田薯,抚属皆有之,临、崇、宜、东四邑出产尤多”^⑪。

近代之民国,本文不再多述,与晚清区别不大,地方文献所见的一些量化信息均能证明番薯是当地第二大粮食作物,全省范围统计如民国 28 年(1935)《江西省农业统计》统计水稻为食用作物大宗,当年产量为 102276903 市石,番薯仅次于水稻为 14397814 市石,之后才是芋(4629420 市担)、大豆、大麦、小麦、小豆、豌豆、玉米、西瓜子、高粱^⑫。番薯虽与水稻差距不小,但是稳坐第二远超芋,其他作物重要性远不能及。

[参 考 文 献]

- [1]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J].中国农史,1985,(4).
[2]黄志繁.清代赣南的生态与生计——兼析山区商品生产发展之限制[J].中国农史,2003,(3).
[3]王保宁.乾隆年间山东的灾荒与番薯引种——对番薯种植史的再讨论[J].中国农史,2013,(3).
[4]李昕升,王思明.南瓜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J].中国农史,2015,(1).

① 道光五年(1825)《万载县志》卷 12《土产》。

② 道光四年(1824)《武宁县志》卷 12《物产》。

③ 道光五年(1825)《新干县志》卷 1《物产》。

④ 道光四年(1824)《清江县志》,转引自《方志物产 257》,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藏,第 181 页。

⑤ 道光三年(1823)《德兴县志》,转引自《方志物产 250》,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藏,第 118 页。

⑥ 咸丰十年(1860)《萍乡县志》卷 1《物产》。

⑦ 同治十二年(1873)《万安县志》卷 4《土产》。

⑧ 同治十二年(1873)《义宁州志》卷 35《艺文》。

⑨ 同治九年(1871)《南城县志》卷 8《节孝》。

⑩ [清]何刚德:《抚郡农产考略》卷下,草类二《薯》,光绪 29 年(1903)刻本。

⑪ 江西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江西省农业统计》,江西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39 年,第 2 页。